



▲在持續推進人工智能研發和應用的同時，必須同步完善社會保障、收入支持、再培訓和勞動力市場緩衝機制。

經濟觀察家

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勞動力市場，在「替代」本身已幾乎不可迴避的背景下，本輪技術變革對就業的核心挑戰，並不在於是否會發生崗位替代，而在於新崗位的創造速度，能否與崗位被替代的速度相匹配。

生成式AI 重塑勞動市場結構

李張丹嘉

勞動經濟學

回顧歷史上的技術革命，舊崗位的消失通常是在相對較長的時間跨度內逐步發生的。這一過程為新技術與生產組織的充分結合、新崗位的孕育與擴展，提供了必要的時間和空間，從而使就業結構得以實現相對平穩的漸進式轉型。

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衝擊下，這一長期形成的「替代—創造」平衡機制，可能首次面臨被打破的風險。首要原因在於，與以往技術革命主要解放或替代人的「體力」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直接作用於人的「認知」乃至「腦力」，並進一步開啟了對「手」的執行能力的替代，由此對就業結構形成了範圍更廣、差異更小的衝擊。

在人工智能廣泛進入實際應用的短短三年時間裏，上述趨勢已在多個專業領域中清晰顯現：在編程領域，相關工具覆蓋了大量開發場景，初級編碼、測試和部署等任務的自動化比例持續上升，初級程序員崗位需求明顯收縮；在內容創作領域，音樂、文案等作品的生成周期被大幅壓縮，重複性創作崗位首當其衝。在行政事務領域，自動化智能體能夠完成文件整理、郵件處理和數據抓取等標準化工作，行政、運營和助理等基礎崗位的生存空間被持續擠壓；在法律、金融等專業服務領域，合同審查、報告撰寫和合規分析等任務完成時間顯著縮短，入門級專業崗位幾乎已完全暴露在人工智能的衝擊之下。

如果說過去三年的變化已經令人目不暇接甚至感同身受，那麼沿着當前的技術迭代路徑，未來的衝擊可能進一步加深「人已插不上手」的現實處境。

近期技術發展的明確方向，是實現「腦」與「手」深度結合的AI智能體。當認知能力與執行能力完成整合，人工智能將不再只是提供建議或輔助決策的工具，而是能夠直接操作系統、調用接口、完成端到端流程的「數字員工」。換言之，人工智能正在從「幫助人類把工作做得更快」，轉向「直接替人類完成工作」。一旦這一技術路徑全面落地，人工智能對人的替代將不再局限於內容生成或單一認知任務，而是擴展至完整的任務鏈條。

技術進步沒有暫停鍵

生成式人工智能帶來的潛在風險已廣受關注，既然風險如此顯著，技術進步是否可以放慢腳步，甚至主動按下「暫停鍵」？從現實的經濟與制度約束來看，答案恐怕是否定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節奏，並非單一企業或單一國家所能自主控制，而是被嵌入到一套高度剛性的全球競爭結構之中。在當前國際格局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已成為國家戰略競爭力與科技企業核心壁壘的必爭之地。任何一方放緩技術迭代節奏，都可能在模型能力、生態構建和應用場景佔領上迅速

被競爭對手拉開差距，並在後續競爭中陷入難以逆轉的劣勢。這種競爭格局在經濟學意義上構成了典型的「囚徒困境」。即便各方都清楚地意識到，技術競賽的持續加速可能帶來系統性風險，但在缺乏有效國際協調機制的條件下，任何單邊減速的行為都會付出高昂的競爭代價。結果是，「不進則退、慢進即輸」成為佔優策略，現實中幾乎不存在主動減速或暫停的可行空間。

與以往技術進步相比，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擴散路徑與成本結構上呈現出明顯不同的特徵。傳統技術升級，尤其是以智能製造為代表的工業技術進步，往往依賴廠房改造、設備購置與產線集成等高額固定資本投入，其推廣過程不可避免地呈現出行業分化、區域分布和時間上的漸進特徵。設備需要逐台部署，崗位通常是在具體生產環節中被逐步替代，就業衝擊因此更容易被局部吸收和分散消化。

相比之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幾乎不依賴具象化的大規模設備投入。通過雲服務、API接口或開源模型，企業和個人即可在幾乎同一時間接入相關能力。開源模型的擴散進一步壓低了使用門檻，使模型能力可以被即時調用，並支持本地部署和低成本定製，其邊際使用成本隨着模型迭代和規模化應用持續下降，甚至趨近於零。

模型一旦完成升級，能力便可被同步複製並快速擴散，技術進步不再沿着「企業—崗位—工序」的路徑逐步傳導，而是直接作用於大量工作流程和任務單元。在這一過程中，工作任務的執行成本正整體性地向更低水平移動。從編程、內容創作與編曲，到合同審查、報告撰寫與數據處理，大量原本依賴人類完成的認知型任務，其成本優勢正在向人工智能轉移。

由此，一些崗位在統計意義上仍然存在，但其內部任務結構已被持續拆解和重組。對於規則明確、流程標準化、重複性較強的認知任務而言，人類勞動的相對價格正在下降，企業在短期內以技術替代人力的激勵隨之增強。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任務執行成本的快速下降，未必能夠與新任務和新崗位的創造速度同步匹配。當既有任務可以被低成本、規模化地自動完成時，企業更容易通過延後招聘、重組崗位內容或直接以技術完成任務來應對需求變化，而新任務的形成、新工作的出現，往往仍依賴組織調整、商業模式探索和不确定性的逐步消化。在這一過程中，崗位替代與崗位創造之間可能出現階段性的速度錯配，從而對就業結構形成持續調整壓力。

研判，為政策制定提供前瞻、實時、精準的依據。

實現這一目標，首先需要改變觀察勞動力市場的基本單位。傳統以「行業」和「職業」為核心的統計框架，已難以反映崗位內部正在發生的結構性變化。生成式人工智能並非整體性地「消滅職業」，而是以任務為單位重組崗位內容。因此，有必要以更為原子化的「任務和技能」取代「行業和職業」，識別哪些具體任務正在消失，哪些技能正在快速貶值或轉向，從而把握職業內部的真實調整路徑。

這一轉向對底層數據與方法論基礎設施提出了更高要求。現有指標體系在更新頻率、對新崗位和新技能的覆蓋，以及對中國勞動力市場的適配性方面均存在不足。僅依賴既有公開指標，難以支撐對生成式人工智能衝擊的精細化研判。因此，有必要在嚴格保障數據安全與隱私合規的前提下，系統整合招聘平台、靈活用工平台等高頻數據資源，構建以「任務—技能」為核心的動態監測體系，在就業數量發生顯性變化之前，盡早識別任務消失、崗位重組與需求轉移的信號，為政策介入爭取時間窗口。

職業培訓需加強前瞻性

更關鍵的是，監測的終點不應是預警本身，而應直接服務於教育與培訓體系的前移調整。本輪生成式人工智能衝擊的核心矛盾，並不在於勞動者是否具備長期適應能力，而在於轉型速度與再匹配效率能否跟上任務替代的節奏。對個體而言，真正的風險往往源於技能調整方向不清、培訓選擇失準，從而在關鍵時期錯失轉型窗口。

因此，公共部門有必要將基於任務和技能的監測結果，直接轉化為教育與培訓的指引信號，前移至學校教育、職業教育和在職培訓體系之中，明確哪些技能需求正在下降，哪些能力更可能與人工智能形成互補，哪些技能具備跨行業遷移潛力。通過提高培訓方向的針對性和前瞻性，可以顯著縮短再培訓與再就業周期，降低轉型過程中的試錯成本，防止短期衝擊固化為長期結構性失業。

最後，在堅持技術進步方向不可逆的前提下，必須同步強化轉型期的風險管理。在當前國際競爭格局下，主動放緩人工智能發展既不現實，也不可行。但本輪技術變革的速度、廣度與深度顯著超過以往，如果政策反應滯後，短期就業衝擊極易在不同階層之間累積並放大，演化為系統性風險。因此，在持續推進人工智能研發和應用的同時，必須同步完善社會保障、收入支持、再培訓和勞動力市場緩衝機制。政策的關鍵作用，並非阻止技術進步，而是防止勞動者因無法跨越短期調整成本，而被永久性排除在新的就業結構之外。

(張丹丹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李嘉為新加坡管理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中歐產業互補 攜手共拓商機



共創共享

早期的歐洲之行獲益良多，與政商學資本界人物的深入交流，各種激烈論點的碰撞都備受啟發。

令人鼓舞的是，在歐洲的變革浪潮中，很多產業都有急切的需求，這些需求為中國企業造就了豐厚的機會。但筆者也不禁在想，為什麼還有企業沒有抓住和歐洲企業合作的機會，與歐洲夥伴攜手共贏全球的黃金時期。

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看最新的外貿形勢。2025年中國進出口總額高達45.47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穩居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中歐則互為第一大貿易夥伴，2025年中歐經貿總額達到了5.93萬億元，佔中國進出口總額的13%，拉動中國進出口增幅0.8個百分點。歐洲方面的數據同樣非常亮眼，2025年前十個月對華貿易超過了7000億美元，佔歐盟進出口總額的14.5%，同樣拉動歐盟進出口增幅超過0.8個百分點。該數據證明中歐經貿早已經是深度綁定，合作基礎非常堅實。

有堅實基礎，也要有良好前景。這次歐洲之行筆者發現，在當地的商業層面，多種行業在當下形勢的挑戰下，對於產業跨界合作有着急切的訴求，且積極把目光放到中國企業之上。其實當歐洲企業面臨的挑戰相當集中，能源成本上升、合規要求趨嚴，以及市場高度碎片化疊加，讓不少技術項目仍停留在「能做出來，難規模化」的階段，真正卡住歐洲企業的不是技術本身，而是從試點走向量產、再到跨區域複製的放大能力。

這些問題恰恰映射出中歐天然的互補空間。一方面，中國政策環境穩定，產業的長期發展規劃完整和體系化；另一方面，中國企業的長處正是完整的產業鏈協同能力、龐大的應用場景，以及工程化和規模化落地速度驚人。歐洲則在技術原創、工藝體系與標準制定方面具備優勢。因此，中歐產業合作正好是一種從技術到場景、從試點到規模的共同加速，也符合歐洲企業現時所需。此外，歐洲還沉澱了大量長期

發展形成的軟實力，這些軟實力與中國高度市場化、工程化的商業體系之間，同樣形成非常強的互補關係。

三領域協同效益大

其中有幾個行業，我覺得是最能突出這種互補關係。第一是養老健康產業，歐洲在養老體系、康復醫療技術、健康管理模式上的經驗非常成熟，標準也很完善，而中國老齡化市場需求巨大，在規模化運營、數字化服務成本控制上有優勢，如果雙方能夠合作，就能把歐洲先進的模式落地中國，又能聯合開拓全球養老市場。

第二是綠色科技產業，歐洲在能源轉型、工業脫碳，還有可持續材料研發上全球領先，而且有明確的政策支持。中國正在全力推動雙碳目標，綠色需求全面爆發，在新能源、裝備製造、產業鏈的配套上實力雄厚。看看去年，中國對歐洲出口風力發電機組增長約66%，進口循環利用型的產品增長19%左右，印證雙方合作的潛力非常大，中國的出口製造能力和市場拓展的能力，加上歐洲核心技術，雙方聯手就能搶佔全球的綠色產業製造高點。

第三是高端消費和服務產業，歐洲的奢侈品、藝術文創、高端服務品牌在全球有巨大影響力，中國中產階級消費升級需求這些年一直非常旺盛，而數字化營銷渠道及產品本地化的經驗也非常豐富。目前中國超過一半的化妝品奢侈品是從歐洲進口，國產的智能家電文創產品也能借助歐洲品牌渠道走向全球，實現「歐洲品牌+中國製造+全球市場」的共贏格局。

從以上例子可看到，歐洲現在就像一個正在重組的拼圖，缺的是能幫它補齊的夥伴，而中國企業家就是能補缺的那個「關鍵拼圖」。最重要的是，只要讀懂中歐產業及市場的互補邏輯，總能在當地找到對的人，因為雙方不是簡單的貿易買賣，而是相互能力的拼接，是1+1大於2的美好藍圖。剩下來的就是一個打通雙方的平台，讓兩國企業都能走上這條進入對方市場的雙向快車道。

(作者為天九企服董事長兼CEO)

樓市續暢旺 豪宅加印花稅影響微



樓市朝陽

近月樓市復甦，交投爆旺程度叫人驚嘆，樓價亦同步節節攀升。日前差估署公布官方樓價指數連升8個月，累積升幅5.8%，回升至近一年半新高，反映市場信心正急速回歸。而「財爺」公布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當中未有進一步支持樓市的「加甜」措施，但公布樓價逾億元的超級豪宅物業，將印花稅稅率由現時4.25%增至最高6.5%。究竟這項「富人稅」會否對正重拾升軌的樓市構成衝擊呢？

個人認為，這對整體樓市影響相當有限。首先，逾億元住宅成交量僅佔大市約0.3%，比例上可謂微不足道；加上當下樓市氣氛熾熱，大手客、長短線投資者及剛需用家均積極「尋寶」，市場購買力充沛，相信無阻目前整體樓價回升的勢頭，故逾億元的成交相信同樣未會受太大影響。

其次，今次調高逾億元住宅印花稅，仍較過往未撤辣前雙倍印花稅的8.5%，以及新住宅印花稅的15%低。對於內地客或公司買家而言，未撤辣前更要繳付3成辣稅(15%買家印花稅+15%新住宅印花稅)，相比之下，今次調高稅率，仍較辣招時期低近8成。

事實上，多項宏觀利好因素，包括交投活躍、減息效應、經濟增長等刺激下，有利資金加快流入樓市，尤其是高端豪宅板塊。今年截至2月24日，逾億元一手超級豪宅成交暫錄34宗，預期今年全年逾億元一手超級豪宅成交量，有望刷新2013年一手銷售條例實施後的紀錄新高。

另一邊廂，市民對樓市前景的信心，亦可從本公司早前的調查中一窺端倪。根據美聯於財政預算案公布前進行「港人置業意向調查」顯示，「經濟前景」(37%)及「樓價」(33.5%)是最影響市民置業決定的兩大因素；而認為樓價「平穩」或「上升」受訪者比例高達89.8%，接近九成，當中看升者佔約54.2%，超過一半。較去年同期調查，只有61.5%的受訪者料樓價「平穩」及「上升」，短短一年內大幅躍

升超過28.3個百分點，反映現時樓市氣氛明顯急速轉好。

受訪者對租金前景的預測更是接近「一面倒」，高達95.3%的受訪者預期租金將「平穩」或「上升」，較去年同樣調查的81.5%，高出13.8個百分點。調查結果清晰反映，可見市民對於樓價及租金雙雙向好的預期，已是廣泛共識；而「經濟前景」才是香港市民入市信心的來源，相信財政預算案此番針對極少數高端物業的微調，難以撼動普羅大眾及主流買家的樂觀預期。

今年樓價料升約15%

展望全年，預期住宅一手成交量有機會達2.2萬宗，續創自2013年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生效後的紀錄新高；二手方面，則估計今年成交量達5萬宗，料創5年新高。樓價方面，預期全年樓價將上升約10%至15%，即住宅物業將連續兩年出現「價量齊升」的格局。

工商舖市場方面，隨着財政預算案提出多項針對工商舖市場及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為市場注入新動能，相信全年工商舖交投可達5000宗，按年升約1成，至於全年成交金額預測，則輕微調高至按年升約6%至730億元。

(作者為美聯集團行政總裁(住宅))

全港逾億元一手及二手住宅註冊量

